

# 以「疏離」自「惘惘的威脅」中出走： 張愛玲的心理傳記

張慈宜\* 丁興祥

輔仁大學心理系

本文以心理傳記學的取向，針對近代重要文學作家張愛玲的生命進行探究。張愛玲的文學創作經常籠罩在一種荒涼／蒼涼的意境之下，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她的人物總是在經歷各種掙扎與奮鬥之後，迎接令人失望的結局。為什麼張愛玲的作品人物費盡心力的掙扎最後總歸於徒勞？藝術創作的母題並非憑空出現，經常與創作者本人的生命歷程有高度的關連性。本研究藉由解答此一創作謎團的過程，逐步揭露張愛玲早年生活中與父親、母親（特別是母親）之間的愛恨糾葛，如何對張愛玲的精神生活帶來騷亂與傷痛，又如何進而發展出精神分析學者 Horney 所謂的疏離型人格。鑑於心理傳記學在國內仍是一門新興發展中的學問，本文亦針對心理傳記學的宗旨與方法做了初步的介紹。另外，我們也針對本研究之探究成果對於人格理論，及諮商、治療實務層面可能產生的貢獻或啟發進行討論，最後並提出我們的建議。

**關鍵詞：**人格、心理治療、心理傳記、家庭

## 壹、緒論

2009年2月24日，皇冠出版社向台灣文壇丟出了一顆震撼彈：張愛玲的遺作《小團圓》，於張辭世14年之後出版了。剎時間，各種正反意見紛至沓來，張愛玲的「傳奇」又添了一筆。

撰文表示要「『拒買、拒讀、拒評』」的張小虹，稱《小團圓》的面世，「在法律程序上是『合法』，但在情感道義上是『盜版』」（張小虹，2009）。其主要根據兩點理由作此斷定，一、張愛玲寫給遺產執行人宋淇的信上曾提到《小團圓》要銷毀一事；二、即便張在世的時分仍有出版此書的念頭，但將心比心，也不應該將仍在修改中，未完成的作品出版。從張小虹（2009）投書報社的文章中，很可以看出張小虹作為張愛玲的「忠實讀者」

\* 通訊作者：張慈宜，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e-mail：023966@mail.fju.edu.tw；02-29052122。

對《小團圓》問世的難過與憤慨。反之，張愛玲的第二任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宋淇之子）則為其出版《小團圓》的決策提出了詳盡的辯護（宋以朗，2009）。其中之是非曲直應交由讀者自行判斷，與本研究的主旨無關，因此不擬在此詳列宋以朗之捍衛理由。倒是多虧這次的出版風波，我們得以從宋以朗（2009）所公布的，與《小團圓》有關的往來信件，得窺這部小說的身世與定位，對致力於梳理張愛玲生命的研究者而言，不啻是個意外的收穫。

長期投入於研究張愛玲的學者周芬伶（2009）表示：「《小團圓》是改寫張愛玲的重要依據」。為何周可以如此斷言呢？根據宋以朗（2009）為《小團圓》所寫的〈前言〉，張愛玲寫給摯友宋淇的信中曾經如此披露：

我在《小團圓》裏講到自己也很不客氣，這種地方總是自己來揭發的好，當然也並不是否定自己。（引自宋以朗，2009：4）

趕寫《小團圓》的動機之一是朱西甯來信說他根據胡蘭成的話動手寫我的傳記……（引自宋以朗，2009：5）

《小團圓》是寫過去的事，雖然是我一直想寫的，胡蘭成現在在臺灣，讓他更得了意，實在不犯著，所以矛盾得厲害……（引自宋以朗，2009：5-6）

我寫《小團圓》並不是為了發泄出氣，我一直認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但是為了國家主義的制裁，一直無法寫。（引自宋以朗，2009：8）

志清看了《張看》自序，來了封長信建議我寫我祖父母與母親的事，好在現在小說與傳記不明分。我回信說，「你定做的小說就是《小團圓》」，現又去信說 euphoria（筆者按：意指興奮）過去後，發現許多妨礙，需要加工，活用事實，請他 soft-pedal（不要聲張）根據事實這一點。（引自宋以朗，2009：8）

這麼多的線索都向我們指出這麼一個事實：《小團圓》這本小說是以張愛玲自己所經歷過的「事實」為本，並且也是她的文章中第一次明白揭露她與胡蘭成的戀情。

在《小團圓》這本小說中，張愛玲顯然已經有了這樣的思想準備：無懼於熟悉她的讀者們「對號入座」。是以，在同樣寫給宋淇的信上，張愛玲這麼寫道：「看過《流言》（註：張愛玲的散文集）的人，一望而知裡面有〈私語〉、〈燼餘錄〉（港戰）的內容，儘管是《羅生門》那樣的角度不同」（引自宋以朗，2009：6）。

可以肯定的是，這部被形容為「坦率得嚇人」（袁瓊瓊，2009）、「自傳已不足以形容它的真實」（張瑞芬，2009）的遺著《小團圓》，將為我們提供理解張愛玲生命的豐富寶藏。

張愛玲一直到生命末期都仍然念茲在茲於《小團圓》的修改工作。如她在1993年寫給皇冠的編輯人員的兩封信上表示：「《小團圓》恐怕年內也還沒寫完，還是先出《對照記》」，

「《小團圓》一定要盡早寫完，不會再對讀者食言」（引自宋以朗，2009：16）。從1976年初稿完成，到1993年仍未改完，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期間的關鍵事件為：宋淇勸阻張愛玲不要發表1976年寫就的版本。根據宋以朗（2009）所披露的宋淇寫給張愛玲的信件，宋淇主要擔心女主角九莉（即張愛玲的化身）難以獲得讀者的同情（部分原因涉及與被指責為漢奸的胡蘭成曾有過一段婚姻關係），而且當時胡蘭成人在台灣，憚胡更藉此書而自吹自擂，牽扯不清。

從現今所得到的線索來看，我們不得不說，張愛玲想必對於《小團圓》中所記述的，或者臨摹的，自身前三十年生命裡的那些重要人事，抱持著「萬轉千迴」的心情。因此，近二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她仍放心不下這個故事，一再修改，希望終有一日能夠發表面世，而不是像宋淇所言「一吐為快」（引自宋以朗，2009：13）之後，就一勞永逸地擺脫這些往事的糾纏。而這也就為本研究的出場提供了一部分的理由，雖然過去我們已經擁有了汗牛充棟、繽紛多彩的張愛玲論述，張愛玲的傳記也出了很多本，然而，隨著最新爆炸性自傳性資料的出土，也許不少論述都面臨了必須要被改寫或修正的命運。

此外，周芬伶（1999）回顧過往的張愛玲研究，整理出幾個主要的方向：（1）著重文學技巧的探討，（2）從社會意識批評作品思想內涵，（3）從女性本位的立場來評論張愛玲小說的價值，（4）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張愛玲，（5）《紅樓夢魘》與《海上花》譯註研究。周芬伶的分類整理中，其實少了一項重要的「傳記研究」，其列舉的第四項「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張愛玲」，其實是偏重於以精神分析的視角來分析張愛玲的作品，而非張愛玲本人。然而，由於張愛玲本人傳奇般的身世以及獨特的行事風格，引發了無數張迷對張愛玲抱持著像「閱讀小報般」的強烈好奇心。是故，關於張愛玲的傳記研究也甚為發達，根據朱旭晨（2010）的調查，至今已出版的張愛玲傳記已近70部。在此茲舉出數例如下：擁有許多第一手觀察資料的《我的姊姊張愛玲》（張子靜，1996）、大陸歷史學者馮祖貽（2001）描寫張氏家族盛衰的《百年家族—張愛玲》、邵迎建（1998）以心理學家Erikson之認同（identity）理論為視角，所撰寫的《傳奇文學與流言人生—張愛玲的文學》、司馬新（1996）以張愛玲的後半生生涯為主的《張愛玲與賴雅》，以及于青（1995）、余斌（1997）、劉川鄂（2000）、蔡登山（2003）等人所撰之張愛玲傳。以單篇論文而言，傳記類的研究明顯遠較探討作品內涵的研究為少，其中較為著名者，係宋家宏（2003）的〈張愛玲的「失落者」心態及創作〉。

這些傳記研究大多由專精於中外文學領域的學者，或藝文界的人士領軍，雖然亦會探索到張愛玲的人格養成與其文學之間的關係，但鮮少使用心理學的理論及研究成果作為研究資源，邵迎建（1998）的著作算是少有的例外。王衛平與馬琳（1997）針對橫跨五十年

的張愛玲研究進行評論，文末呼籲：欲了解張愛玲作品中之內涵（如：悲劇意識），尚有待於對張愛玲的心靈世界有更加深入的探討。而且，他們也注意到心理學的知識寶藏能夠對張愛玲內心世界的深刻了解做出貢獻，因此建議以精神分析取向作為其中一個必要的探究取向。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以誕生於專業心理學界的心理傳記取向來研究張愛玲，可謂開闢了一條嶄新，並且有價值的研究路線。

從研究的角度來看，較為可惜的是：目前皇冠所出版的《小團圓》，是 1976 年張愛玲寄給宋淇的版本，而不是她生命最後階段還在修改的版本。與張愛玲弟弟合寫《我的姊姊張愛玲》的季季向皇冠的編輯部徵詢過，他們手上並無張愛玲晚年進行中的版本（季季，2009）。不過，這不是研究者可以控制的事了。無論如何，《小團圓》的出版，絕對是張愛玲研究素材上的一項重大突破！

在結束這段前言之前，最後要提一點：雖然這本小說以張胡之戀而備受矚目，但讀者們其實很容易就發現，寫到母親的部分要比胡蘭成的部分多了很多。而這也就預示了本研究的主軸方向，其餘的就請容稍後詳述了。

## 貳、文獻探討

### 一、作為一種研究法的心理傳記學

根據 Elms (1994) 的追溯，第一本心理傳記作品是 Freud 的《達文西對童年的回憶》(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而心理傳記學 (psychobiography) 這個名稱也是由 Freud 所命名的。

那麼何謂心理傳記呢？Runyan 將之定義為「在傳記中清楚地使用系統化或正式的心理學」(Runyan, 1984: 201)，McAdams 的定義與此大同小異，但更為完整：「系統性地使用心理學（特別是人格）理論以將生命轉譯成一個連貫，並且具有啟發性的故事」(McAdams, 1988: 2)。也就是說，心理傳記學位於心理學和傳記學這兩個領域的交集點。

心理傳記學以理解單一個體的生命為主要目標，同樣地，一般的傳記作者也在作相同的工作，並且在其理解傳主的過程中，也經常動用作者本人社會生活多年所結晶下來的對於人性的看法，此亦即心理學家 Heider (1958) 所謂的，一般人也有屬於自己的素樸心理學。素樸心理學中並不乏那些閃爍著智慧光芒的見解，然而，其中也會有比較粗製濫造，或甚至具有嚴重偏誤的推論。關於後者，社會心理學家長久以來已經致力於發現其中的各種偏差與謬誤。那麼，心理學作為研究人類心理行為或說人性的一門專業學科，為什麼不

將其研究所得應用到傳記學這個領域呢？如同 Anderson 所說的：「如果心理學對於人們－其複雜性及其慣常的型態與動機－能夠說些什麼的話，那麼傳記學就是一個應該將心理學的理解妥善加以應用的領域了」(Anderson, 1981: 265)。

## 二、個體生命研究的心理學傳統

雖然主流心理學以實證主義方法論為依循，著重於探討一般人的基本心理歷程或行為傾向，以尋找通則定律為目標。但心理學的發展歷史上，並非沒有關懷個體生命獨特性的傳統。在這個發展路線上，臨床心理學、諮商心理學領域對於個案生命史的關注可為代表。

至於在人格心理學領域，則要歸功於 Allport (1937) 及 Murray (1938) 兩人的推動。Allport 在他的人格心理學教科書中這樣提倡：「有眾多的方法可以研究人的心理。然而，最完整的方式是：將他當成一個個體來加以研究。他不只是一堆習慣的集合；不只是一組抽象向度的匯聚；也不只是他的種屬的一個代表性人物」(Allport, 1937: 565-566)。

Murray 亦有近似的想法，他有一個極為著名的主張，同時也是廣被引用的一段名言：「一個個體的一生應該被當作一個單位，心理學的長單位 (long unit) ……」(Murray, 1938: 39)。而另外一段話，則與本研究的主旨更為貼合：

環境一直變化。……隨著每一瞬間的流逝，有機體也跟著變化，從不精確地重複它自己。沒有任何時光，任何時期是整體的典型。……這些現象讓 [心理] 傳記成為必須做的事。(Murray, 1938: 43)

礙於篇幅，我們無法在此詳細闡述個案生命研究在心理學的發展歷史，Runyan (1984, 2005) 的著作，對此有頗為清晰的介紹，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參閱。至於心理傳記的發展情形，則可參考 Runyan (1988, 2005) 的說明，國內的部分，則請參閱丁興祥與賴誠斌 (2001) 的〈心理傳記學的開展與應用：典範與方法〉一文。

## 三、心理傳記學能夠有什麼貢獻？

Allport 和 Murray 兩人都相信將人格理論應用到單一個案的傳記研究上，不但可以藉此說明人格的概念，而且還可以進一步將人格理論加以修正或者精鍊 (McAdams, 2005)。也就是說，理論在解釋傳主生命所面臨的困難和侷限，都回過頭來成為人格理論發展上的挑戰。此外，Elms (1994) 及 Anderson (2005a) 亦分別針對心理傳記學對整體心理學的貢獻進行了系統性的梳理與論述。

如果我們將焦點特別對準到治療的領域的話，心理傳記學又可以做出什麼樣的特殊貢

獻呢？首先，在諮商、治療領域，向來其所關注並且擅長的，正是深入理解個體生命的複雜性與各種糾結矛盾，此項任務與心理傳記學的努力基本上並無二致，只是心理傳記學無須面對瞭解之後的協助工作而已。因此，心理傳記學的努力成果很可以為心理治療領域所參考、援用。其次，誠如 Elms (1994) 所提到的，臨床心理個案由於隱私保護的問題，相當多的資料不能公開，即便公開的案例，基於保護原則也歷經大幅度的改寫，因此其他實務工作者或研究者難以對案例進行檢驗。然而，大多數的心理傳記乃是針對公眾人物進行探究，所採用的資料也多屬公開檔案，不僅可供不同的研究者進行檢驗，也豐富了對傳主提出不同詮釋的空間。

#### 四、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議題

人的一生很長—以我們的傳主而言，張愛玲活了 75 歲 (1920 ~ 1995)，悠遠的生命長河裡會發生很多事，有很多的議題值得分析處理。而且，一般而言，心理學家會選擇一個公開資料比較豐富的人來作為研究對象，否則缺乏足夠的佐證資料，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 (Schultz, 2005a)。因此，心理傳記作者需要面對的比較不是資料不足的問題，而是資料堆積如山的問題。礙於時間精力，也礙於期刊發表篇幅的限制，心理傳記學者通常不選擇撰寫全傳，而以某個生命階段，或者某個主要的生命議題作為探究的主題。

張愛玲的文學作品，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她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一種荒涼意境，她在《怨女》這部小說中的這段簡短的文字，即十分具有代表性：

一條藍布市招掛在一個樓窗外，在風中膨脹起來，下角有一抹陽光。下午的太陽照在那舊藍布上，看著有點悲哀，看得出不過是路過，就要走的。今天天氣實在好，好又怎樣？也就跟她的相貌一樣。(張愛玲，2000b：78)

曾經使用過「荒涼」或「蒼涼」這樣的詞彙來形容張愛玲作品調性的說法，簡直不可勝數。我們隨手就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夏志清稱「『蒼涼』、『淒涼』是她所最愛用的字眼」(劉紹銘等譯，2001/1979:340)；楊照 (1996) 和楊澤 (1999) 都認為張愛玲建立了一種「荒涼美學」；王德威則用「1979 蒼涼史觀」(王德威，1996：198)、「蒼涼卻華麗的末世視野」(王德威，1996：197) 來形容張愛玲的文學視角。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文學評論者及讀者都可以欣賞張愛玲的這種文學視野，例如唐文標就不客氣地寫道：

她筆下陰暗的故事背景都一樣：舊的黑影，老的荒涼，從開始到結束，即是從沒希望走到沒希望，她的故事沒有愛、沒有溫暖、甚至沒有人間的味道。(唐文標，1995：43)

從文學評論的角度，張愛玲的荒涼美學應當得到什麼樣的評價？這遠遠不是本研究所

關懷的重點，我們只是藉此點出：不管是欣賞，或者是批評張愛玲作品的讀者，皆難以忽視瀰漫在她作品中的這個蒼涼意象。

張愛玲在她的第一本小說集《傳奇》的再版序（1944年）裡曾經對此加以解釋，把自己的「荒涼」意識歸諸於時代的快速變遷無常：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裏有這惘惘的威脅。（張愛玲，2000c：6）

張愛玲在1952年離開中國大陸前，確實是身處於一個動盪不安、戰亂破壞的時空中，因此類似的「時代論」說法亦為某些學者所認可。如楊照採納柯靈在〈遙記張愛玲〉一文中所提出來說法：上海的淪陷才給了張愛玲在文壇上大顯身手的機會，「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柯靈，1995：24），主張張愛玲之所以荒涼，「恐怕正在於她透透徹徹的明白、因為有這麼大的毀壞時代，這麼無常變幻的局勢，所以才有她立足發揮的空間」（楊照，1996：257-258）。

張愛玲和楊照的說法，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都顯得合理。但我們是否滿足於接受這樣一個簡單解釋呢？與張愛玲同一世代的作家並不少，而且像她一樣在1940年代走紅之後迅速歸於沈寂的作家如蘇青，作品也並不以荒涼聞名。因此，我們顯然還需要其他的解釋。本研究正是希望透過對於張愛玲個人生命歷程的深入剖析來解答此一謎團：為什麼張愛玲的小說總是營造出一種悲哀、蒼涼的意境？為什麼她的小說人物費盡心力的掙扎最後總歸於徒勞？如果用心理學的语言來問的話，我們要問的是：為何張愛玲的作品總是透露出一種悲觀意識？誠如Schultz所言：「藝術是內在世界的一種投射。」（Schultz, 2005b: 137）而文學家作品中的核心主題，往往亦反映了作者本人生命中的核心議題（Anderson, 2005b）。因此，本研究將藉助心理學的理论，帶領讀者們一同探詢張愛玲生命中到底發生了哪些重要的經歷，以致於她會發展出這麼樣一種悲觀意識？

## 貳、研究方法

### 一、傳主的選擇

就本研究而言，傳主的選擇當然就是張愛玲。一般來說，心理傳記學對於傳主的選擇並無嚴格的規定，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法則可言。Gedo針對一般傳記的要求，同樣也適用於心理傳記領域：「要寫出一部成功的傳記，必須精通傳主活動的領域」（引自Runyan,

1984: 231)。對於舞蹈一無所知的人，很難寫出一部舞蹈家的好心理傳記。

由於心理傳記研究必須耗費大量的時間搜集並且閱讀傳主的資料，因此 Elms (1994) 提出一個很實際的建議：最好要選擇一個你願意長時間（可能至少要花費一兩年的時間）相伴的人。但對於傳主的興趣卻不可以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這樣可能無法保持開放的心態，容易受到強烈的情感所誤導。同樣地，如果某個目標人物會引發你另外一種極端的情感—憎恨、厭惡，也不適合被選擇來作為傳主。

本文兩位作者都出身於社會及人格心理學的訓練背景，但分別對於文學、文學批評及歷史有相當程度的涉獵。選擇文學作家來進行心理傳記研究，同時兼顧了兩種需求，一方面是作者本身對於文學的高度喜好，另一方面則是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傳主，作家的作品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

而張愛玲之所以雀屏中選，主要的理由除了她是作者喜愛（但非崇拜）的作家之外，也在於張愛玲作為一名擁有廣大讀者的作家，作品影響了許許多多的人，就知識傳播的立場而言，張愛玲的心理傳記研究成果不僅可以為學術知識的積累發展做出貢獻，也可以吸引一般人在閱讀之後返身關照自己的生命，對生命產生更深刻的了悟。知識應為社會所用，誠乃學術發展的宗旨之一。

## 二、研究的程序

關於研究程序的部分，我們借用心理傳記研究之前輩，美國柏克萊大學心理學家 Runyan (1988) 所提出來的「了解個體生命暨研究者知識進展之流程圖」(詳見圖一)，作為我們研究進程的框架。接下來，我們即針對每一個步驟進行說明，說明中除了介紹 Runyan 的主張，也一併交代了本研究的實際操作辦法。

### (一) 收集資料與證據

所有對於了解傳主有幫助的資訊都是研究者可以採用的資料。如：傳主的作品、日記、筆記、書信、自傳、照片等，或者是傳主的親朋好友對傳主所做的記述，有授權或無授權的傳記資料等，其他如結婚證書、醫療紀錄等檔案也有可能是寶貴資訊。如傳主仍然在世，還可以針對傳主及其生命中重要他人進行訪談。

以本研究而言，張愛玲並無寫日記的習慣，但她有一些散文及小說作品訴諸個人之經驗，而且亦有相當數量的與親人、友人之間的往來信件被公布出來，這些都成為本研究的重要參考。加上，張愛玲的傳記（其中包括由她弟弟所推出的《我的姊姊張愛玲》）、訪談、熟人所寫的見聞，以及針對她的文學作品所進行的研究、評論等，都為深入瞭解張愛玲的生命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 （二）針對資料及證據進行批判性的檢視

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也具有不太一樣的可信度，舉例來說，面對非第一手消息的「據說……」資料，就必須抱持著高度的警戒。此外，Elms（1994）的提醒尤須銘記於心，Elms 將 Freud 沒有明說的心理傳記規範整理出來，其中第一項應該嚴加防範的守則就是「論點應避免建立在單一線索之上」（Elms, 1994: 40）。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線索，都經過不同資料來源加以比較檢視，以確定資料的可靠性。

## （三）背景知識及理論

除了要具備心理學的專業知識，以及跟人類生命發展有關的生物、醫學知識之外，也要具備關於傳主生活重要面向的背景知識（詳情請見稍早前「選擇傳主」一節的說明）。

## （四）提出解釋

接下來，就可以根據經過批判性檢驗過的資料／證據，嘗試以心理學的理論來對傳主的生命提出可能的解釋。人類的生命往往非常複雜，因此對於關鍵的生命事件，或者是傳主不斷重複出現的行為模式，可以提出的理論解釋可能不只一個。就本研究而言，我們也確實前前後後思考了不只一個心理學的重要概念與理論。

## （五）針對各種解釋進行批判性的檢驗

並不是說心理傳記追求的是唯一「正確的」解釋，但在各種可能的解釋中，進行批判性的檢驗仍然是必要的。本研究曾經嘗試過不只一種解釋，有些解釋初步看起來合理，但用張愛玲更多的生命歷程資料，或更多不同來源的資料來加以檢核時，即會出現相互矛盾，或者解釋不夠全面的缺點。最後，Horney 的理論在一路批判性檢驗的過程中脫穎而出。

## （六）生產生命故事

到了這個階段，就可以開始將傳主的重要生命經歷，與運用心理學理論所產生的生命詮釋結合成生命故事。在圖一中，我們之所以看到的是複數的生命故事，是指研究者有可能分別處理傳主好幾個不同生命階段所發生的重大經歷，而每一單獨的生命故事之探索，都重複經歷從步驟 1 到步驟 6 的研究循環。

## （七）針對生命故事進行批判性的評估

撰寫了研究所要呈現的生命故事之後，需稍微從研究者的身份跳出來一下，以論文評審者的角度，或者是參加個案研討會的角度，對各個生命故事進行批判性的評估。檢查故事中有沒有證據不充分或者矛盾的地方，或者是解釋不合理之處，如果有的話，就還要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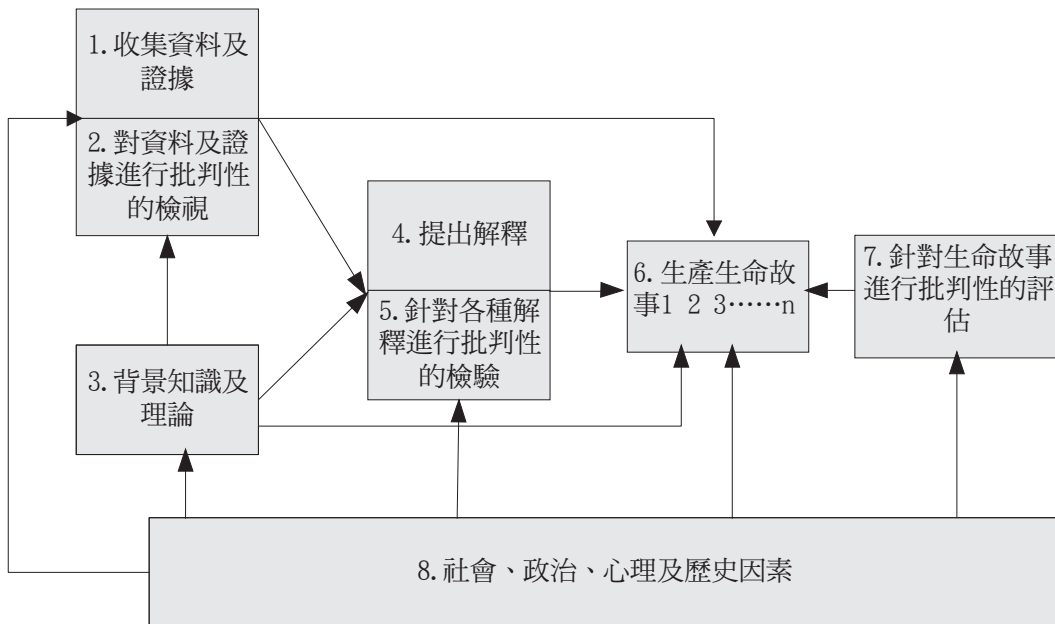
進行故事的修正。

#### (八) 社會、政治、心理及歷史因素

正確地來講，這一個項目並不能稱為第八個步驟，從圖一中，讀者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每一個研究步驟都得要綜合考量社會、政治、心理，及歷史因素的可能影響。

因為傳主張愛玲跟研究者分處於不同的生活時空，因而我們更需要對於傳主生活的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有所了解。為了對張愛玲及其父母兩代人成長階段的時代背景更能掌握，我們使用了一些針對民國初年到二十年代，以及民國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教育、家庭、女性意識等議題的文獻作為參考。

資料來源：Runyan, 1988: 307



圖一 了解個體生命暨研究者知識進展之流程圖

## 肆、研究結果

### 一、張愛玲的出身背景

夏志清在其 1961 年所出版的《中國現代史》中，以超過魯迅的篇幅來評論張愛玲，稱其為「可能是五四運動以來最有才華的中國作家」（劉紹銘等譯，2001/1979：275），且

稱讚《秧歌》「在中國小說史已經是本不朽之作」(劉紹銘等譯, 2001/1979: 335), 而《金鎖記》則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劉紹銘等譯, 2001/1979: 343)。閻純德(2000)針對中國大陸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們, 進行了一項「20世紀中國十大女作家」的調查。結果, 每一位學者所交回的名單中, 張愛玲都是榜上有名。另外, 一些在張愛玲死後才出版的文學史著作, 則紛紛為張愛玲開闢專節介紹, 並且稱她為「主流文學之外的重要收穫」(朱棟霖等, 2001: 276)、對「人性的深度的挖掘方面, 現代作家中極少有人能與張愛玲比肩」(孔范今, 1997: 947)、將「市民小說的文化素質提高到相當雅致的高度」(王文英, 1999: 6)。以現今的眼光來看, 張愛玲在中國現代文壇的地位, 由此可見一斑。

但是張愛玲並不是一直享有這樣的盛名與地位的。在1940年代的上海文壇, 她宛如一顆流星般地劃過天際, 璀璨卻短暫。當她重新走紅起來, 那是好多年後的事了。不曉得當時的張愛玲「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 是否也有一種「陳舊而迷糊」的淒涼感(張愛玲, 2000c: 140) ?

#### (一) 令人稱羨的豪華身世 ?

然而, 在張愛玲活躍的年代裡, 她則是一個穿透力十足的人物。既有辦法吸引嚴肅的評論, 也能在市井小道間引發追逐她身影的流言蜚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她的奇裝異服, 上海漫畫家文亨曾為當年上海有名的三位女作家(張愛玲、蘇青、潘柳黛)繪製了一幅漫畫, 其中蘇青所得到的註腳是「輯務繁忙」, 張愛玲則是「奇裝炫人」(張子靜, 1996)。又有謠傳說她的衣服「奇」到讓整個巷弄的小孩子跟在她後頭看熱鬧、讓整個印刷所的工人為之停工。這則傳說的可信度, 老實說不無可疑, 因為在目前的文獻中, 此一傳說的來源係出自與張愛玲素有嫌隙的潘柳黛, 而潘柳黛在同一篇文章中所出現的錯誤, 雖不能說是「俯拾皆是」, 也到了令人嘆息的地步。為了節省篇幅, 茲舉一例說明之, 潘說張愛玲對於其貴族身分「一再加以提及, 裨眾周知」(潘柳黛, 1996: 26), 然而她自己一聽再聽的結果卻是連張愛玲的出身都無法正確道出。她說張的父親娶了李鴻章的外孫女為妻, 其「貴族血液」(潘語)猶如太平洋死了一隻雞, 上海人喝了黃浦江的自來水就說自己喝了雞湯一般!

那麼正確的說法應當是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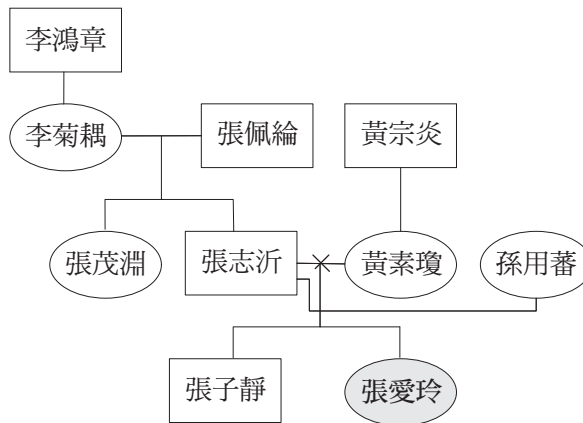
張愛玲1920年出生於上海。祖父張佩綸, 直隸豐潤人, 1848年出生, 23歲中進士, 27歲授翰林侍講。張佩綸原為清流黨的要角之一, 與張之洞等人合稱「翰林四諫」。後來仕途發展受挫, 卻受李鴻章的賞識, 在張佩綸喪偶之後, 主動將大女兒許配給張。結婚時, 張佩綸40歲, 李菊耦23歲, 是張的第三任妻子(馮祖貽, 2001)。

1903年，56歲的張佩綸因肝病而過世（馮祖貽，2001；張愛玲，2000f）。從張佩綸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常常一方面憂心時政，一方面感傷自己的身世（因為種種原因，張佩綸與李鴻章結為親家之後，仕途並未平順）（張佩綸，1966）。陳寶琛說他「憂傷君國，往往中夜起立或被酒拉下，寢以成疾」（馮祖貽，2001：125）。作為張佩綸的舊友，陳寶琛此說或許有美化之嫌，卻也並非毫無根據之言。

《對照記》中有一張照片是李菊耦與一雙年幼子女的合照。李菊耦嘴唇緊閉，面容顯得堅毅冷峻，張愛玲甚至說她在祭祀用的遺像中更加「陰鬱嚴冷」（張愛玲，2000f：52）。

李菊耦在1901年11月7日喪父，1902年喪兄，1903年1月31日喪夫（馮祖貽，2001）。在短短一年多的期間內接連失去了她生命中至親的三人，其心情之悲傷沈鬱可想而知。然而，她不得不打起精神來，因為與張佩綸永別的這一年，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才七歲，姑姑張茂淵才兩歲。此後，她獨自肩負起教養子女的責任十年，在46歲那年告別人世。

圖二 張愛玲之家庭圖



## （二）妄想挽住時代巨輪的舊家庭

有一千多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在1905年由清廷廢除，同一時期教育也起了大變革。其實新式學堂自戊戌維新時期（1898年）即已開始設立，在科舉制度廢除之後，數量更是快速增加，1906年全中國有23862所，到了1908年已達47955所，成長率超過100%。新式學堂的授課內容，根據調查，滿清末年時經典類的傳統知識只占27.1%，而數學理化等新知識達72.9%，到了民國初年，則前者更萎縮到僅占8.4%（楊齊福，2004）。這是古國

國民面對時代要求所做出的回應。

但時代的呼聲並未穿透張家厚實的圍牆，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從來沒有進過學校，受的還是傳統的塾師教育。因此，張志沂背了一篇篇的古文、時文、奏摺等這些在張愛玲口中既心酸又「毫無用處」的學問，然後「一輩子繞室吟哦，背誦如流，滔滔不絕一氣到底」，「像籠中獸，永遠沿著鐵檻兜圈子巡行，背書背得川流不息，不舍晝夜」（張愛玲，2000f：50）。並且，張愛玲與弟弟自幼也是受私塾教育。一直到張愛玲 10 歲，母親不顧父親的強烈反對，「像拐賣人口一般」，硬把她送到學校就讀（張愛玲，2000a：40）。弟弟則更晚，13 歲才插班入小學五年級（張子靜，1996）。

課子甚嚴的李菊耦大概料想不到張志沂在 57 歲病故之前，合計有工作的時間不過八、九年，可說幾乎一輩子都仰仗她的豐厚妝奩過活，而萬貫家產（1935 年在上海虹口還有八棟洋房出租，1922 年分產時所得的財產想必更是驚人）最後只落得剩下一間比他家「以前的佣人房還不如」的十四平方米（約莫相當於 4.2 坪）小屋得以棲身（張子靜，1996：285）。

在張愛玲的眼中，像李菊耦這類的女族長們經常對外面的世界充滿恐懼。而她們的恐懼的確是有歷史條件與物質條件作為基礎的。辛亥革命爆發時，李菊耦先是帶著一家人從南京搬遷到青島，1912 年又搬到了上海。之所以選擇青島及上海作為「避難」的地點是有道理可循的。張愛玲〈花凋〉裡面的遺少鄭先生「因為不承認民國，自從民國紀元起他就沒有長過歲數」（張愛玲，2000d：203）；而她的堂伯父，最後一任兩江總督張人駿，當年每次聽小小年紀的張愛玲背誦「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時，就忍不住流淚（張愛玲，2000f：10）。這些遺老遺少們將自己的命運緊緊地與滿清帝國拴在一起，所以當民國政府成立時，對他們而言的確是宛若大禍臨頭般需要逃往各地的租界尋求庇護。

### （三）踩著三寸金蓮走天下的母親

張愛玲的母親黃素瓊也是系出名門，祖父是曾任長江水師提督，並獲贈三等男爵的黃翼升。獨子黃宗炎曾中舉人，在黃翼升死後繼承父親的爵位，到廣西去出任鹽法道道台。由於黃家三代單傳，黃宗炎婚後又一直沒有小孩，於是回到原籍湖南長沙鄉下買了一個農家女作為姨太太。黃素瓊與其雙胞胎弟弟就是由這位姨太太所生的，父親在他們出生前就在廣西病故，生母也早逝，因此黃素瓊姐弟是由嫡母養大的（張子靜，1996）。

雖然同樣來自於守舊的遺老家庭—張愛玲的姑姑比黃素瓊小五歲，已經是天足，黃卻還是纏足（張愛玲，2000f），可為一例證，黃素瓊卻走向了與張志沂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徑。她做了與她那個時代絕大多數的婦女不一樣的選擇：先是「拋下」了兩個幼子出國，後來

又與丈夫離婚（是她主動要求的）。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這位勇敢闖蕩的女子在張愛玲的生命中扮演了無與倫比的角色。

## 二、白蠟封住了心：張愛玲的壓抑與疏離

張愛玲寫道：「她內心有一種混亂，上面一層白蠟封住了它，是表面上的平靜安全感」（張愛玲，2009：241）。在另外一處，她又寫道：「九莉盡量的使自己麻木。也許是太徹底了，不光是對她的母親，整個的進入冬眠狀態」（張愛玲，2009：292）。然後，離開中國，已在美國生活多時的張愛玲，有一天看到一個小女孩自己一個人攀著小鐵門爬上爬下，一次又一次不厭其煩，突然醒悟：「覺得就是她自己。老是以為她是外國人—在中國的外國人—因為隔離」（張愛玲，2009：219）。

### （一）Horney人格理論的發展脈絡

這些都讓我們聯想到精神分析學家 Horney 理論中的疏離型（detached）人格。在我們進一步使用 Horney 的理論來理解張愛玲之前，我們需要先對 Horney 的理論背景及其應用稍加說明。

Horney 出生於 1885 年的德國，1915 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她的理論與 Freud 一樣都是建基在對於心理困擾者（其中大部分是神經症患者）的觀察之上，此外，Horney 「試圖認識併解決自身問題的努力」也對其理論之形成有莫大的影響（引自 Paris, 1994: 139）。關於後者，《陰影中的臉：人格理論中的主觀性》（Faces in a Cloud: Subjectivity in Personality Theory）及《心理學的締造者：個人因素》（Makers of Psychology: The Personal Factor）這兩本書皆提醒世人注意：心理學理論，或說人格理論的內涵，與理論創始者自身的經歷之間具有高度的關聯性（Paris, 1994; Anderson, 2005a）。理論提出者與理論之間存在著聯繫的這個事實，非但沒有使其理論變得無效；反而因為理論家是在一種強烈動機的驅使下研究那些與己切身的議題，因而能夠比旁人更加深入，更加透徹的洞察此一部份的人性掙扎。

Horney（1945）本人強調正常人也會面臨神經症者所遭遇的困難與掙扎，只是程度不同、因應的方法沒有那麼強迫性而已。Freud 也曾經清楚地宣示：「健康與疾病，正常人與神經症患者之間不再有顯著的差別」，並且強調神經症的症狀是一種結構，是壓抑所產生的結果，一般人在發展的過程中同樣也會經歷這類的壓抑（劉平等譯，2000/1964：118）。因此，我們將 Horney 的理論應用到張愛玲身上，並不影射張愛玲有任何精神方面的症狀或障礙，我們只是藉助 Horney 的敏銳觀察力，來幫助我們理解張愛玲身上那些並非為她一人所獨有，其實是跟某部分的人所共享的矛盾焦慮，以及應付這些矛盾焦慮的防衛機

制。

## （二）「基本焦慮」及「疏離型」人格傾向作為一種防衛機制

Horney 理論的核心是：環境中的不利因素，尤其是家庭中的有害條件，將導致人產生基本焦慮（basic anxiety），而為了對抗基本焦慮，個人會發展出一些弄巧成拙的、相互矛盾的防衛策略（Paris, 1994）。什麼是家庭中的有害條件呢？其主要的特徵是「缺乏真正的溫暖與愛」（Horney, 1937: 80）。因為渴望父母的愛，以及文化規範所給予的壓力，那些無法獲得其想要的溫暖與疼愛的孩子經常不得不壓抑對於父母的敵意。

敵意的壓抑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即 Horney 所謂的「基本焦慮」—「一種面對潛伏著敵意的世界的無助感」（Horney, 1939: 74-75）。張愛玲思想底色裡的「惘惘的威脅」，除了當年特殊時代背景所帶來的效應，恐怕還更多了我們此處所討論的基本焦慮。Horney（1945）把人們因應基本焦慮所採取的防衛機制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趨向他人（moving toward people）、對抗他人（moves against people），以及遠離他人（moves away from people），分別對應順服型（compliant）、攻擊型（aggressive），及疏離型（detached）三種人格類型。限於篇幅，我們不一一介紹三種類型的人格，而只介紹可以用來解釋張愛玲的疏離型人格。

疏離性人格最大的特點是：努力想要成為自給自足的人，渴望獨立，需要與別人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感到安全，因此他們往往費力保有自己的隱私，以求不受別人的干擾。其中的重要癥結在於，由於他們缺乏安全感，缺乏被愛、被需要的自信心，所以即使別人的一點點拒絕的表示，即便是開玩笑，也很容易讓他們感受到挫折或屈辱。因此與別人保持距離，儘量做到自立，以使得自己的內外需求都不需要仰仗別人，便成了一種保護自己的有效手段。

## （三）張愛玲的「疏離」傾向

張愛玲的不愛交際應酬、不愛與人打交道一向是聞名的。張愛玲的遺囑執行人，也是張愛玲晚年最親近的幾位朋友之一的林式同先生，提到他第一次與張愛玲見面的經過：「敲了門後，裡面窸窣窸窣的好一陣子，一位女士用緩慢輕柔帶點抱歉意味的聲音說：『我衣服還沒換好，請你把信擺在門口就回去吧，謝謝！』我轉身走向電梯的當兒，聽到後面有關門的聲音，回頭一看，那封信已經不見了」（林式同，1996：17）。水晶本人跑到美國想要見張愛玲時，也吃過閉門羹（水晶，2000），在 1968 年張愛玲應殷允芃訪問時，則說自己是「孤獨慣了的」，又說自己「像是一個島」（殷允芃，1996）。然而，這並不是張愛玲老年之後才形成的傾向，早在她 19 歲所寫的〈我的天才夢〉一文中，她就已經寫道：「在沒

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張愛玲，2000e：242)。

另外，張愛玲的「戀物」傾向：對於物質所帶來的感官上的，及美學上的愉悅，較之一般人更具有纖細品味的鑑賞力，並因此而對於物質世界充滿愛戀之情，已為許多論者所注意到(如：余斌，1997；王德威，1998；張小虹，1999等)。然而，張愛玲戀物卻不「役」於物的行事風格卻很少人予以特別的注意。以讀書為例，她從小嗜閱讀(張子靜，1996)，港戰時，張愛玲在躲避轟炸的當兒，仍一心惦念著她正在閱讀的《官場現形記》能不能看完(張愛玲，2000a)。特別的是，她幾乎從來不買書不藏書，不管是在大陸時期或者是後來移民美國的時候都是如此(胡蘭成，1990；殷允芃，1996)。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其實，張愛玲這種不尋常的習性，一旦放在 Horney 的理論框架下，就不會顯得奇怪了。Horney (1945) 注意到疏離型人格其實並沒有喪失感情活躍的能力，書本、動物、自然、藝術、食物等這些人際關係之外的領域，只要沒有讓疏離者感受到他們的自由遭受到威脅，他們完全可以品味。但這些興趣、慾望，或者快樂一旦讓疏離者覺得有過於依賴的危險，他們就會撤退。對於他們而言，世界既然總是瀰漫著隱隱然的不安與威脅，保護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持超脫與獨立，不管對象是人或物。

疏離型的人不僅會因為想要保持獨立自足而對自己的需要進行限制，他們同時也會限制自己的願望。「他們在意識或潛意識中相信：最好不要去願望或期待任何事」(Horney, 1950: 263)，不然的話，他們的願望「不是受挫，就是被用來促成其依賴性」(Horney, 1950: 276)。Horney 認為這種傾向牽涉到一種悲觀的人生觀：覺得無論如何生活總歸是徒勞。

在張愛玲的文學作品中所發散出來那種荒涼，其實正是這種已被許多評論家及研究者所注意到的悲觀的人生觀(如：司馬新，1996；劉紹銘等譯，2001/1979；宋家宏，2003等)的產物。除了極少數成功的「例外」—〈傾城之戀〉的白流蘇和范柳原因為一座城市的傾頹而成全了他們的戀情，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茫然不覺地做著各種「惡俗的」(迅雨，1995；王安憶，2003)掙扎與努力，然而最終的結果，願望幾乎總是落空，甚至於走向悲慘的未來。

至此，我們已經看到張愛玲在很多方面都很符合疏離型人格的特性，根據 Horney 的理論，疏離型人格主要是為了因應家庭中的傷害所發展出來的一種自我防衛，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張愛玲家庭生活的樣貌。

### 三、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醞釀出「惘惘的威脅」（基本焦慮）的家庭生活

許多人談到張愛玲家庭的不幸，包括她的中學老師（汪宏聲，1996），以及那些研究她的創作，或者為她作傳的人（如：余斌，1997；楊澤，1999；平路，1999；林幸謙，2000；宋家宏，2003等）。

#### （一）囚禁事件斬斷了對父親徘徊在同情與鄙夷之間的情感糾葛

張愛玲最著名的家庭事件應該要屬她 17 歲時被父親毆打、囚禁達半年一事。18 歲，尚未開始其作家生涯的張愛玲，曾經把這個事件寫成 '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標題據稱是報社下的），發表在《大美晚報》（Evening Post）上（張子靜，1996），後來，在走紅於上海時所發表的〈私語〉、暮年的《對照記》，以及自傳小說《小團圓》中，都可以看到張愛玲對於這個事件所做的或詳盡或清淡的描述。同一段經歷，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一再加以提及，的確說明了這段經驗是傳主生命中難以抹滅的銘刻。

加上，張愛玲在散文裡，曾經赤裸裸地說出她對父親家的鄙夷：

我父親的家，那裏什麼我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做《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強行分作兩半，光明與黑暗，善與惡，神與魔。屬於我父親這一邊的必定是不好的……（張愛玲，2000a：162）。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有些學者會將張愛玲小說創作的潛意識動機，鎖定在對於父親的憎厭，及復仇心態之上（如林幸謙，2000）。在此，我們想提出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不論對於父親，或者母親，張愛玲都抱持著矛盾的情感。並且，由於我們接下來要說明的種種因素，與母親之愛恨糾葛對張愛玲的生命所造成的衝擊要遠大於父親的影響。

事實上稍早前的那段引述文字並不完整，只擷取前半段容易造成一種純粹負面情感的印象。張愛玲對父親家並非只是「黑暗」、「惡」和「魔」這類負面的感受而已，張愛玲在同一段落接下來如此寫道：

……屬於我父親這一邊的必定是不好的，雖然有時候我也喜歡。我喜歡鴉片的雲霧，霧一樣的陽光，屋裏亂攤著小報，…看著小報，和我父親談談親戚間的笑話——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父親的房間裏永遠是下午，在那裏坐久了便覺得沈下去，沈下去。（張愛玲，2000a：162）

在那個永遠讓人下沈的房子裡，確實也存在著一些張愛玲喜歡的東西，喜歡的氛圍。而且，張愛玲知道，也可以具體感受到父親對她的親愛與喜愛，並不真如司馬新所謂，從她「無愛的父親」那從未得到過她所尋求的關懷（司馬新，1996：106）。除了可以跟父

親笑談親戚間的人情八卦，在《小團圓》中對於父女之情也有一段很溫柔的記述。描寫八歲時，父親帶她到舅舅家玩，表姊們想要她多玩一會兒，讓她藏起來，父親「帶笑不耐煩的」叫她出來（張愛玲，2009:100）。乘人力車回家時，小張愛玲「坐在他身上」（張愛玲，2009:101），然後：

「舅舅的姨奶奶真不漂亮——舅母那麼漂亮，」她說。

他笑道：「你舅母笨。」

她很驚異，一個大人肯告訴孩子們這些話。

「你舅舅不笨，你舅舅是不學無術。」

她從此相信他，因為他對她說話沒有作用，不像大人對孩子們說話總是訓誨，又要防他們不小心洩漏出來。（張愛玲，2009:101）

父親拿張愛玲當大人一般平等對待，奠下了張愛玲對父親的信任基礎（雖然日後有其他的的事件來破壞），1976年，已經56歲的張愛玲仍然惦記著這個瑣碎而溫暖的記憶，並不是沒有道理的，等到我們討論到張愛玲與母親的關係時，讀者就會更清楚這段記述的重要性。

張愛玲從小就有志於寫作事業，自言七歲寫了第一篇小說（張愛玲，2000d），「九歲起就開始向編輯先生進攻了」（張愛玲，2000a:124）。而在她發展寫作的路途中，支持、欣賞她的「重要他人」正是父親。她讀中學時的習作《摩登紅樓夢》，回目は張志沂代擬的，張愛玲自己也說「頗為像樣」（張愛玲，2000a:125）。另外，張愛玲小學或者是中學時候，曾經仿照報紙形式，自己編寫製作了一張副刊，據張子靜（1996）表示：父親看了很高興，有親朋來訪，就拿出來得意地炫耀。

無論如何，等到在後母的挑唆之下，張愛玲被父親毆打軟禁的事件發生之後，張愛玲確實親身感受到父親冷酷的一面。後來，她從軟禁事件脫逃，永久地離開父親的家。此後，終其一生只曾經返抵家門一次（迫不得已，要求父親支付大學學費），並且坐不到10分鐘就走了（張子靜，1996）。父親，對於張愛玲而言，既有灰撲撲，她瞧不起的那一面，也有記憶中比較溫情的那一面。她一方面同情父親生命中的空虛，因為所受的傳統教育，在大時代的齒輪之下，真成了個平白走了「漫漫長途」的虧本生意，半點不合乎時宜。在《小團圓》中，令人驚訝地，張愛玲至少在五個不同處，一再表達了對於父親處境的了悟：「像籠中的走獸，……九莉替他覺得痛心」（張愛玲，2009:94）、「『錢攔在身上多渥兩天也是好的。』九莉可以感覺到他的恐怖」（張愛玲，2009:96）、可以想像祖母「與她父親的恐怖一樣，都是永遠有出無進的過日子」（張愛玲，2009:120）、「她太熟悉他的恐怖」（張愛玲，2009:125）、「她太深知她父親的恐怖」（張愛玲，2009:151）。從這些地方，以及

從我們在「身世」那一節中所引述的張愛玲描述遺少生活的文字，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張愛玲對於身為遺少之一員的父親之命運有著極為深刻的理解。但，另一方面，對於父親的自私，她也同樣是了然於心的，張愛玲寫道：「她一直知道她父親守舊起來不過是為他自己著想」（張愛玲，2009：297）、「就連我父親的保守性也是有選擇性的，以維護他個人最切身的權益為限」（張愛玲，2000f：37）。

## （二）她最愛的人也傷她最重：張愛玲與母親的愛恨糾葛

然而，所有的這些兩面性，以及冷冽殘酷的禁閉事件，都比不上母親為張愛玲的精神生活所帶來的矛盾、掙扎，與痛苦。在《小團圓》中，母親有一次對九莉說她知道是父親傷了九莉的心。張愛玲使用了強烈的字眼來表露她的情緒：

九莉猝然把一張憤怒的臉掉過來對著她，就像她是個陌生人插嘴講別人的家事，  
想道：「她又知道二叔傷了我的心！」又在心裏叫喊著：「二叔怎麼會傷我的心？  
我從來沒愛過他。」（張愛玲，2009：138）

這裡的二叔指的是父親，因為張愛玲口頭上過繼給大房，因此稱呼自己的爸媽二叔二嬸。誠如余斌（1997）所謂，張愛玲從未對父親寄予厚望，所以也不會有太大的失望。Freud 曾說「愛使我們更加沒有抵禦力：在愛的時候，我們對痛苦的抵禦能力比任何時候都更為軟弱；而一旦我們失去了所愛的對象或他對我們的愛，我們也最容易感到無比的不幸」（嚴志軍、張沫譯，2003/1927：74）。綜觀張愛玲所有的自傳性作品，對於父親，她從未使用過「愛」、「喜歡」，或「喜愛」這樣的字眼。但卻有非常多的線索告訴我們，張愛玲一直戀慕著她的母親。只不過這個單方面的愛慕從很早以前就摻入了一些苦澀的雜質……

張愛玲在《對照記》用長段的篇幅來介紹母親的英勇事蹟，說她母親「踏著這雙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註：從小纏足）（張愛玲，2000f：20），語氣中充滿愛戀與得意：

她在阿爾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註：姑姑是天足）。……

她畫油畫，跟徐悲鴻蔣碧微常書鴻都熟識。

珍珠港事變後她從新加坡逃離到印度，曾經作尼赫魯的兩個姊姊的秘書。

一九五一年在英國又一度下工廠做女工製皮包。……

她信上說想學會裁製皮革，自己做手袋銷售。……

我小時候她就自己學會做洋裁，也常見她車衣。但是她做皮包賣的計劃似乎並未成功，來信沒再提起。……她不幸早了二三十年。

她總是說湖南人最勇敢。（張愛玲，2000f：20-22）

關心婦女問題的言論與活動其實在五四之前就已經開始崛起，學者白佩蘭所提供的數字或許可以作為一項參考指標，據其表示，在五四運動爆發前，所出現的討論婦女問題的期刊雜誌至少達 100 種（鄭魯琳譯，1994）。但無疑地，1919 年打著反封建旗幟的五四運動肯定是中國婦女運動的一個高潮。有學者曾經寫道：「綜觀五四時期的刊物，幾乎沒有不刊登婦女問題文章的，凡關心社會進步，擁護社會改革的人沒有不關心婦女問題的」（陳功，2000：169）。然而，即便具備這樣的時代背景，就如馮祖貽（2001）所做分析，黃素瓊以一個有兩名幼子（張愛玲 4 歲，張子靜 3 歲）的已婚少奶奶的身分，出洋遊學的行徑仍屬於相當大膽的舉動。事實上，黃素瓊不僅有膽識，勇於開創自己的未來，還稱得上多才多藝，並且擁有尋常女子不可能有的「浪漫」經歷，至少在張愛玲心目中的形象是如此。此外，我們不可忽略的是，張愛玲的母親是一個漂亮出眾的女人。從前母親到張愛玲的學校去時，她總感到「得意非凡」（張愛玲，2009）。

不光是在《對照記》中出現前述那一段頌揚母親的文字，在多篇散文裡，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張愛玲對母親的「真情流露」，例如：在〈必也正名乎〉張愛玲曾侃侃大談命名的學問，到最後，則自承之所以戀戀於自己俗氣的名字，完全是為了母親為她取名字的一點回憶（張愛玲，2000a）。在〈私語〉中則提到家裡怎樣因為母親的歸來，增添了華美的色彩，不但父親痛改前非戒毒，而且一家人搬遷到了一所花園洋房。她說「我母親和一位胖伯母並坐在鋼琴凳上模仿一齣電影裡的戀愛表演，我坐在地上看著，大笑起來，在狼皮褥子上滾來滾去」（張愛玲，2000a：160）。到了十二歲，母親再次出國的時候，張愛玲還跑到姑姑家（註：出國前，母親與姑姑合住在一起）去呼吸具有母親氣味的空氣，因為「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的，都在這裡了」（張愛玲，2000a：162）。

然而，這羅曼蒂克的愛逐漸在現實的壓力下一點一滴地變質了。在〈童言無忌〉中，張愛玲不無苦味地寫道：「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張愛玲，2000a：8），並且描述了這種現實的難堪如何毀損了她的愛：

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個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裡她是遼遠而神秘的。……可是後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張愛玲，2000a：8）。

這段描述中，首先會躍入眼簾的是「錢」成了謀殺女兒對母親浪漫愛的劊子手。但是，如果在這段文字逗留得稍微久一點，就會發現其實是女兒對於母親的愛恨掙扎，才是這份愛受到凌遲的關鍵。為了看清楚這個關鍵，我們需要藉助張愛玲在另一篇文章〈私語〉中

的一段描繪：

我補書預備考倫敦大學。在父親家裏孤獨慣了，驟然想學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難。同時看得出我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我也懷疑著。常常我一個人在公寓的屋頂陽臺上轉來轉去……。仰臉向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張愛玲，2000a：167-168)

從父親的家逃離出來之後，搬去與母親（及姑姑）同住，失去了從前的瞭望的距離，「現實」這堵牆毫無迴旋空間地逼了上來。現實是什麼？現實是女兒一直渴望擁有一份「無目的」及「無條件」的愛。「她一直覺得只有無目的的愛才是真的」(張愛玲，2009：165)，「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最需要的」(張愛玲，2000f：52)。然而，在張愛玲的感受裡，母親一直在裁判、衡量著她為張愛玲所做出的犧牲是否值得，而且連她自己都不得不懷疑自己是否值得這犧牲了。很清楚地，這份母愛的質地並不是無條件的。值得嗎？值得嗎？張愛玲心中的母親在問？張愛玲自己也在問？在〈私語〉這篇家庭記事裡，張愛玲沒有提供答案，然而從下面的這段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張愛玲一直以來都有屬於她自己的解答。

三十幾歲的九莉看了棒球員吉美·皮爾索的傳記片，「哭得呼嗤呼嗤的，幾乎嚎啕起來」(張愛玲，2009：291)。對張愛玲來說，這是一件非比尋常的事，因為她多次自承自己是個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了（如：張愛玲，2009），胡蘭成也說她「從來不牽愁惹恨」(胡蘭成，1990：286)。因此，這部傳記片中一定有什麼東西勾動了張愛玲內心深處最幽微，最脆弱的部分。是什麼呢？吉美的父親從小栽培他打棒球，但吉美「無論怎樣賣力也討不了父親的歡心」。張愛玲說他成功了之後「發了神經病」，「沿著看台一路攀著鐵絲網亂嚷：『看見了沒有？我打中了，打中了！』」(張愛玲，2009：291)。張愛玲一直渴望能夠討她所戀慕的母親的歡心，但結局有所不同的是，她似乎從未真正獲得母親的肯定。我們當然無從知道母親真實的想法，但實際的母親怎麼想並不重要，張愛玲心中的母親怎麼看才是一切的關鍵。

張愛玲用九莉的口吻說著自己內心的台詞：

自己知道不是她母親心目中的清麗的少女。(張愛玲，2009：134)

九莉終於微笑道：「我一直非常難受，為了我帶累二孀，知道我將來怎樣？二孀這樣的人，倒白葬送了這些年，多可惜。」

蕊秋（註：母親的化身）頓了一頓，方道：「我不喜歡你這樣說—」

「『我不喜歡你，』句點，」九莉彷彿隱隱的聽見說。(張愛玲，2009：40)

最後的這句話十分經典，直辣辣的一句話點出張愛玲最深沈的失落。

那些在〈童言無忌〉、〈私語〉中影影綽綽現身的母親的身影，在《小團圓》全都被清晰的曝曬出來，成為一張張清晰的相片。

〈私語〉中所說的，「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難」，以及在〈天才夢〉中所提及的「『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張愛玲，2000d：241），在《小團圓》中全都成了更加凜冽、痛苦得多的具體經歷。茲舉兩例如下：

蕊秋這次見面，似乎打定主意不再糾正她的一舉一動了……。她覺得她母親對她死了心了，這是絕望中的一著。」（張愛玲，2009：42）

九莉「噯呀」了一聲，耳朵裏轟然一聲巨響，魂飛魄散，知道又要聽兩車話：『你有些笨的地方都不知道是哪裏來的，連你二叔都還不是這樣。』『照你這樣還想出去在社會上做人？』她想起那老西崽臉上諂媚的笑容，心理羞愧到極點」（張愛玲，2009：134）

除了「淑女」訓練的失敗與難堪之外，《小團圓》中所刻劃的，因為母親的「犧牲」所引發的精神戰役也更為慘烈。在母親不稱意的時候，有時候會明白地訴怨張愛玲拖累了她。「想想真冤一回來了困在這兒一動也不能動。其實我可以嫁掉你，年紀輕的女孩子不會沒人耍。反正我們中國人就知道『少女』」（張愛玲，2009：137）。於是乎，我們先前引述過的那一段「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的文字，在《小團圓》中有了情緒張力更高，細節描繪更加清晰，揭露更加徹底的版本：

有客來，九莉總是拿本厚重的英文書到屋頂上去看。……這時候錢也花了，不能說「我不去了。」不去外國又做什麼，也不能想像。她看不起自己。

而且沒良心。人家造就你，再嘀咕你也都是為你好，為好反成仇。

讓你到後台來，你就感到幻滅了？

她想到跳樓，讓地面重重的摔她一個嘴巴子。此外也沒有別的辦法讓蕊秋知道她是真不過意。（張愛玲，2009：145）

這段描述非常清晰地反映了張愛玲身上，因為母親所引起的激烈精神衝突，甚至到了想要自殺的地步，為的是向母親表白她對於牽累母親的萬般過意不去。

如果在母女關係中，母親對於張愛玲從頭到尾都只是展現「要求」，及「怨受其累」的這一面，我們很難想像張愛玲對母親的戀慕能夠這樣執拗。事實上，母親對於張愛玲並不是只有責罵而已，為了讓張愛玲擁有自立的能力，她對張愛玲的教育費了很多的心力，張愛玲能夠從舊式私塾轉換到新式學校的跑道，完全歸功於母親的極力爭取與堅持。又，

為了幫張愛玲出國留學做準備，以每小時五美元的驚人價格延聘外國人為張愛玲補習數學（張子靜，1996）。此外，相較於張愛玲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笨拙，母親則幹練機敏，手腕靈巧的多。她很懂得把握每個適當的時機費心把關係打點好，「永遠想替九莉取得特殊待遇」（張愛玲，2009：150）。

而且，張愛玲深知黃素瓊所出身的遺老家族，「女結婚員」是女性「唯一的出路」（張愛玲，2000d：205），而嫁入這類守舊頹敗世家的女人，到頭來，很容易成為「繡在屏風上的鳥—悒鬱的紫色緞子屏風上，織金雲朵裏的一隻白鳥。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黴了，給蟲蛀了，死也還死在屏風上」（張愛玲，2000d：16）。因此，黃素瓊出洋開創自己的新生活，並不只是有錢婦人的浪漫冒險之旅而已，它代表的是在落伍、下沈，沒有光的封閉世界中「破繭而出」的英勇壯舉，也因此，母親旅居國外時的那些經歷（請見稍早前所引述的《對照記》中的描繪），在張愛玲的眼中尤其洋溢了繽紛華美的色彩。

我們的分析進行到這裡，已經可以看到反覆出現的主題：即張愛玲一直戀慕著她的母親，企盼著成為母親心目中能夠欣賞、肯定的那個女兒，然而她卻一直達不到母親的「淑女」標準，處處使得她在母親面前感到窒礙窘迫。而且也正因為對於母親的欽慕愛戀，她格外渴望能夠得到母親的愛，然而母親的愛在現實世界與金錢的遭逢裡，總是留下難堪的記憶。這些窘迫、這些難堪，有時候也逼著張愛玲憤怒、憎恨起母親來，但很快地她又為自己的「忘恩負義」感到負咎，而且對母親的愛雖然逐漸磨損，卻始終沒有完全消逝，於是，張愛玲對母親的情感一再地陷入矛盾痛苦的拉扯。

### （三）「家」再也回不去了：以「疏離型」人格傾向保護自己免於「惘惘的威脅」

我們確實有證據可以證實張愛玲慣常壓抑對於母親的不滿與憤怒。在張愛玲所有自我敘事的散文裡，對於母親，從來沒有口出惡言過，不像對於父親可以直言批評。舉例來說，當張愛玲在提及她對母親的愛逐漸損毀時，只用了「為她的脾氣磨難著」這樣一個隱約的說法，並且一方面仍為母親解釋開脫，是由於「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之故。然而在多年之後寫下的，揭露秘辛的《小團圓》中，事情就有了另外一種風貌。張愛玲清楚描述當年母親過境香港，到學校去看她時，為她帶來的恥辱，同時也以對照的方法，透露出母親的自私。當時母親入住了香港最貴的飯店，而她卻一副窮酸學生樣，需要修道院免費收留她一個暑假（因為大學宿舍暑假不開放）。張愛玲寫道：「九莉在旁邊卻奇窘，知道那是香港最貴的旅館，她倒會裝窮，佔修道院的便宜，白住一夏天」（張愛玲，2009：29）。

再回到年輕時所寫的〈童言無忌〉中，張愛玲寫道：「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

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張愛玲，2000a：8)。這委實是一種非常壓抑、非常迂迴的反向表達法，不說母親不爽快給她錢，或者是給了錢之後又要抱怨自己的犧牲，而是反過來說愛一個人必須愛到很徹底才有辦法向他拿零用錢；此外，明明沒有通過「愛」的考驗的人是母親，但在張愛玲的表述裡，卻成了自己。

比起一般人而言，敏感聰慧的張愛玲對於這些愛的考驗更加敏銳，對於考驗結果的感受也更加深刻凜冽。為了避免時不時受到刺激，她設法讓自己麻木，用一層白蠟將易於沸騰的心封閉起來。但是就精神分析理論的觀點來看，事情並不會這樣結束，那些激烈並且矛盾的情感掙扎會在性格結構中留下銘刻，影響到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所有姿態以及行為模式。對張愛玲而言，就像 Horney 理論中的疏離者一樣，她讓自己遁入了書本、寫作，以及對於物質的愛戀品味之中，以保護自己不受到那些「與人交接的場合」所伴隨的「咬嚙性的小煩惱」所挫折。

張愛玲在《小團圓》中有一段極為傳神的描繪可以作為此處分析的結語：

蕊秋一說要找個歸宿，在這一剎那間她就看見個幽暗的穿堂，舊式黑色帽架，兩翼正中嵌著一面鏡子，下面插傘。像她小時候住過的不知哪個房子，但是她自己是小客人，有點惴惴的站在過道裡，但是有童年的安全感，永遠回到了小客人的地位。(張愛玲，2009：41)

童年的家曾經帶給張愛玲安全感，然而，成長的過程中，「家」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再也回不去了。歸宿，此一人生在世最終的去處，應該可以免於外界威脅，可以讓人盡情放鬆，可以帶來溫暖撫慰的安全處所，對於張愛玲也已不復存在了。她永遠只能像個「有點惴惴的站在過道裡」的「小客人」。由此來看，她的小說人物之所以總是在一片蒼茫，看不見積極未來的地景上，努力卻徒勞地掙扎著，也就不是那麼一件值得驚異的事了。

##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對於張愛玲「荒涼文學」的文學基調之建立，提出了心理傳記學角度的詮釋。在解決此一議題的過程中，我們著重分析了家庭對於張愛玲的傷害，以及張愛玲為了調適與克服此一傷害所發展出來的心理防衛機制。我們的分析探究帶來了幾項重要的啟發與提醒。

### 一、關於人格理論層面

首先，我們在本研究中援引了西方的人格理論來解釋張愛玲的生命，協助我們對張愛

玲的生命有更加深入的洞察。但需要提醒的是，我們並無將張愛玲的人格結構完全等同於 Horney 所謂的疏離型人格之意，因為人性非常之複雜，展現在每一個個體身上時也有無窮無盡的變化形式。誠如高行健所謂：「人的生存狀態恐怕大於任何理論。任何關於人的解說，乃至於任何哲學對人的解說，都是不全面的，都是解說不盡的」（高行健，2008：222）。舉例來說，張愛玲轟動一時的奇裝異服行徑，便與一般疏離型之人刻意遠離人群的表现似乎顯得不能協調。然而，由於促使張愛玲「奇裝炫人」此一現象出現之背後心理動力十分之複雜，可能需要一篇完整的論文才能處理得當，恕我們無法在此進一步申論之。

Elms (2005)，對此有個精妙的比喻：將各種不同的人格理論比喻成各種尺寸、款式、材料各不相同的手套。對於每一特殊的個體來說，沒有一雙手套在各個方面完全適合。因此，一個人格理論只要能夠對於個體的許多特殊層面做出解釋，提高我們對此個體生命的深入洞察與體悟，就算成功詮釋的案例。

回到 Horney 的理論本身，這樣一個異文化的心理傳記研究，為她的理論建構增添了可推廣應用到相異文化（中國大陸相對於德國）的理論效度。對人格心理學，或整體心理學領域而言，則讓我們見證了人性雖然變化萬千，但重要的人類共同經歷對人所造成的共通影響卻可以跨越相異的時空而成立。對於台灣的臨床實務界而言，在屬於華人的性格與治療理論仍有待開發，必須大量仰賴國外理論來理解、處理個案的現行階段，本研究的成果可說增加了一點我們應用西方理論的信心。同時這也在闡明一種態度：對於任何外國理論或概念的援引，有必要批判性地考核其理論效度，而不是毫不加以批判地全盤套用。

以本研究為例，雖然 Horney 的理論對張愛玲人格結構的許多層面提出了良好的解釋，但亦有其不足之處。舉例來說，對於父親完全死心，對於母親又充滿愛恨掙扎的張愛玲，不得不一方面壓抑對於母親的敵意，一方面發展出疏離型的人格型態以在這個充滿「惘惘的威脅」（亦即 Horney 的「基本焦慮」）的世界中自我保護，這些都是 Horney 的理論框架提供給我們的有效指引。然而，Horney 的理論比較像是一套分類體系，對各種不同人格類型的特徵有極為豐富的描繪，但對於同樣為了應付「基本焦慮」，為何有些人發展成疏離型，其他一些人卻發展成攻擊型或順服型的人格型態，則較為缺乏發展歷程的動力說明。因此，我們需要同時參照張愛玲本人既有的性格特性、才華稟賦、家族背景，以及身處時代脈絡等因素之交互作用。亦即欲對單一個體之生命做出比較周全的解釋，恐怕不是直接將特定人格理論套用上而已，事實上還必須參酌目標人物之個人、家庭、及社會文化背景之因素彼此之間如何互動，才能做出比較貼近的詮釋。

張愛玲在《小團員》中頻密地使用「窘」這個字眼來形容人際互動的狀態，既用來形容自己，也應用到互動中的另外一方，這表示她對於人際之間的「窘態」非常敏感。篇幅

所限，僅舉幾例以饗讀者：

緒哥哥矮，九莉自從竄高了一尺，簡直不敢當著他站起來，怕他窘。」（張愛玲，2009：106）

她沒拿給他看，她最怕使人覺得窘……（張愛玲，2009：175）

九莉這才覺得有了藉口，不用感到窘了，也可以留他吃飯了。（張愛玲，2009：185）

從迅雨（翻譯名家傅雷的筆名）稱讚張愛玲的文字，我們亦不難看出，如果不是張愛玲對於人際互動，尤其是互動中種種扞格、尷尬之情形異常敏銳的話，她對於人際摩擦的描繪很難到達如此傳神的境界。傅雷這樣寫道：

微妙尷尬的局面，始終是作者最擅長的一手。時代，階級，教育，利害觀念完全不同的人相處在一塊時所有曖昧含糊的情景，沒有人比她傳達得更真切。（迅雨，1995：323）

張愛玲對於人際「窘態」之敏感，很有可能與她從小就具備細緻的觀察力，以及身處於沒落世家的龐大家族網絡中有關。舉例來說，《小團圓》中提到的這件小事，就可以充分顯示出小張愛玲已能不被事物的表層所迷惑，能注意到周遭成人未加以意識的細節。

南京來人總帶鹹板鴨來，女傭們笑碧桃愛吃鴨屁股，她不作聲。九莉看見她凝重的臉色，知道她不過是吃別人不要吃的，才說愛吃。只有她年紀最小，又是個丫頭。（張愛玲，2009：223）

張愛玲曾經如此調侃其親族人口之蔓衍：「他們本來親戚特別多，二嬸三姑在國外總是說：『不要朝那邊看—那邊那人有點像我們的親戚。』（張愛玲，2009：165）龐雜的親族系統本來就易有人際之紛擾，再加上如我們先前所述，作為抗拒新中國，同時也為新時代所拒的遺老家族，政治權力喪失的同時，經濟也跟著像溜滑梯一樣走下坡，家族成員之間的矛盾也就更加劇烈。因此，張愛玲身為沒落「貴族」之一員，從小就有很多機會看到、聽到她的親族們在一個逐步走向破敗的封閉世界中，如何輪番上演逢迎、欺瞞、攻防、傾軋的故事。這些從小聽聞、目睹的人際醜惡面，一方面既可能強化了張愛玲的「基本焦慮」，另一方面則讓生性敏感的張愛玲益加敏覺於人與人交往中幽微的，乃至於慘烈的鬥爭。對於不擅於人際應對進退的張愛玲來說，迴避人際交往所可能帶來的困擾與風險，想來是較合乎其自我保護利益的作法。再加上，張愛玲所喜愛並且擅長的閱讀和寫作活動，都是可以讓她全心投入，脫離現實人際紛擾的有效工具，這些因素互相加成，促使張愛玲逐步發展出她的疏離型人格特性。

## 二、關於諮商與治療的層面

本研究的探究成果可以為臨床治療領域帶來幾項重要的提醒與建議。

### （一）對個體的精神生活而言，對重要他人的矛盾情感，或者負面情感的壓抑，要比負面的情感對當事人的傷害更大

雖然我們先前曾經說過張愛玲對於父母的情感都是矛盾的，但很清楚地可以看得出來，對於父親的情感是負面遠大於同情。基本上在毆打事件發生之後，張不管是在心理層面，或者是實質的生活層面，都已經將父親驅逐在外。因而除了當初的毆打、禁閉留下來的心理傷痕之外，相對而言不受到父親的影響。

然而如我們先前述，對於母親的愛恨矛盾掙扎，則為張愛玲的精神生活帶來錐心的痛苦與騷亂，為了內心的平衡，張愛玲努力壓抑對於母親的負面情感，並進一步發展成疏離型的人格。

這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提醒：對生命中重要他人的矛盾情感，要比負面的情感，對當事人帶來更加強烈的傷害。因此，在臨床情境中，我們不光是需要注意案主所表達出來的明顯的敵意或憤怒，案主對於負面情緒的否認，或者是在一味的孺慕中，偶爾洩露出不一致的情感，都是非常值得追蹤留意的。

### （二）崇尚孝道的文化規範使得案主對於父母的負面情感不易有出口

我們前面已經論證對於父母負面情感的壓抑將可能為案主帶來重大的精神傷害，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華人世界，強調家族主義，講究孝道文化，將使得案主對於父母的負面情感更被壓抑。葉光輝與楊國樞（1991）回顧相關的研究，指出：近代華人社會雖然受到西方現代化思潮的巨大影響，然而不管是在台灣，或者香港、大陸，孝道「仍然是人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價值或德行」（葉光輝、楊國樞，1991：96）。另據余德慧（1991）的分析，華人的訓諭系統極為強調「子順」的訓練（如：大家所熟知的二十四孝），而將父母的恩情預設成前提。因而，子女的「不順」與評價性的焦慮有相當程度的相關，扮演「乖孩子」成了解決評價性焦慮的重要方式。其實這也等於在說，華人社會因受到孝道文化影響，子女沒有太大的空間容許表達對父母掌控的不同意，以及負面性的情感，一旦有各種「不順」的情感產生，往往需要壓抑。

因而，在諮商、治療情境中，治療者可能需要從文化規範的鬆綁做起，讓案主清楚明白：不管父母的出發點是不是「愛」，他們的作為都有可能對子女造成傷害。唯有當案主有條件可以讓自己內在對父母的負面情感開始浮現，其與父親或母親的真實關係才不會籠罩在幢幢的陰影之中，讓案主的問題核心被遮蔽起來。

### （三）寫作或其他藝術形式，其所具備的「與自己內心對話」及「與世界溝通」的功能值得重視

「我的生命裡總是和他人隔著一條鴻溝，寫作是幫助我跨越鴻溝的途徑」此話出自日本作家柳美里之口（引自章蓓蓓，1999：5），柳美里本人也經歷了困難的原生家庭生活。目前關於自我書寫在協助個體生命轉化歷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有許多文獻論述，如胡紹嘉（2005）、賴誠斌與丁興祥（2005）、鄧明宇（2005）等。礙於篇幅的關係，我們無法在此針對此一議題進行詳述。但從過去的文獻，以及從本研究中張愛玲因對於母親的愛恨衝突而陷入極度的痛苦當中，卻能保持心智不至崩潰，也未發展出嚴重的精神病症，寫作著實扮演了一個重要的保護功能。一方面，寫作讓張愛玲能夠持續與其內在自我展開對話，另一方面則在為了自我保護而盡量不與人周旋交際的狀態下，保有與世界溝通的窗口，而不至於完全退縮到一個人的孤島中。如何在治療情境中，善用「自我書寫」作為生命轉化的工具，很值得治療者進一步思考探究。

### 參考文獻

- 丁興祥、賴誠斌（2001）。心理傳記學的開展與應用：典範與方法。應用心理研究，12，77-106。
- 于青（1995）。張愛玲傳。載於于青（主編），尋找張愛玲（44-239頁）。北京：中國友誼。
- 孔范今（主編）（1997）。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山東：文藝。
- 水晶（2000）。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台北：大地。
- 王文英（主編）（1999）。上海現代文學史。上海：人民。
- 王安憶（2003）。世俗的張愛玲。載於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主編），再讀張愛玲（269-274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王德威（1996）。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載於蔡鳳儀（主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196-210頁）。台北：皇冠。
- 王德威（1998）。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麥田。
- 王衛平、馬琳（1997）。張愛玲研究五十年述評。學術月刊，11，88-96。
- 司馬新（1996）。張愛玲與賴雅。台北：大地。
- 平路（1999）。傷逝的周期——張愛玲作品與經驗的母女關係。載於楊澤（主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11-233頁）。台北：麥田。
- 朱旭晨（2010）。張愛玲傳記寫作與研究綜述。浙江師範大學學報，35（1），28-31。
- 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2001）。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

- 余斌 (1997)。張愛玲傳。台中：晨星。
- 余德慧 (1991)。中國社會的人際苦痛及其分析。載於楊中芳、高尚仁 (主編)，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 (291-362 頁)。台北：遠流。
- 宋以朗 (2009)。《小團圓》前言。載於張愛玲 (主編)，小團圓 (3-17 頁)。台北：皇冠。
- 宋家宏 (2003)。張愛玲的「失落者」心態及創作。載於鄭樹森 (主編)，張愛玲的世界 (151-172 頁)。台北：允晨文化。
- 汪宏聲 (1996)。記張愛玲。載於陳子善 (主編)，私語張愛玲 (1-8 頁)。浙江：文藝。
- 迅雨 (1995)。論張愛玲的小說。載於于青 (主編)，尋找張愛玲 (313-328 頁)。北京：中國友誼。
- 周芬伶 (1999)。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台北：元尊文化。
- 周芬伶 (2009, 4 月 26 日)。真的「小團圓」嗎？中國時報，13 版。
- 季季 (2009, 4 月 23 日)。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E4 版。
- 林式同 (1996)。有緣得識張愛玲。載於蔡鳳儀 (主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 (9-88 頁)。台北：皇冠。
- 林幸謙 (2000)。張愛玲論述——女性主體與去勢模擬書寫。台北：洪葉。
- 邵迎建 (1998)。傳奇文學與流言人生——張愛玲的文學。北京：三聯。
- 柯靈 (1995)。遙記張愛玲。載於陳子善 (主編)，私語張愛玲 (15-25 頁)。浙江：文藝。
- 胡紹嘉 (2005)。于秘密之所探光：遭遇的書寫與描繪的自我。應用心理研究，25，29-54。
- 胡蘭成 (1990)。今生今世。台北：三三書坊。
- 唐文標 (1995)。張愛玲研究。台北：聯經。
- 殷允芃 (1996)。訪問張愛玲。載於蔡鳳儀 (主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 (153-166 頁)。台北：皇冠。
- 袁瓊瓊 (2009, 3 月 8 日)。多少恨：張愛玲未完。聯合報，E2 版。
- 高行健 (2008)。論創作。台北：聯經。
- 張子靜 (1996)。我的姊姊張愛玲。台北：時報。
- 張小虹 (1999)。戀物張愛玲——性、商品與殖民迷魅。載於楊澤 (主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177-210 頁)。台北：麥田。
- 張小虹 (2009, 2 月 27 日)。「合法盜版」張愛玲，從此永不團圓。聯合報，A4 版。
- 張佩綸 (1966)。潤于日記。台北：學生。
- 張愛玲 (2000a)。流言。台北：皇冠。
- 張愛玲 (2000b)。怨女。台北：皇冠。
- 張愛玲 (2000c)。傾城之戀——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之一。台北：皇冠。

- 張愛玲 (2000d)。第一爐香——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之二。台北：皇冠。
- 張愛玲 (2000e)。張看。台北：皇冠。
- 張愛玲 (2000f)。對照記——看老照片簿。台北：皇冠。
- 張愛玲 (2009)。小團圓。台北：皇冠。
- 張瑞芬 (2009, 3月7日)。張愛玲的《小團圓》，今生今世對照記。聯合報，E3版。
- 陳功 (2000)。家庭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章蓓蓓 (1999)。速寫柳美里。載於柳美里 (著)，家族電影 (3-5頁)。台北：城邦。
- 馮祖貽 (2001)。百年家族——張愛玲。台北：立緒。
- 楊照 (1996)。在惘惘的威脅中——張愛玲與上海殖民社會。載於蔡鳳儀 (主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 (254-266頁)。台北：皇冠。
- 楊齊福 (2004)。清末廢科舉的文化效應。中州學刊，140，103-106。
- 楊澤 (1999)。世故的少女——張愛玲傳奇。載於楊澤 (主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9-26頁)。台北：麥田。
- 葉光輝、楊國樞 (1991)。孝道認知結構組型之分析。載於楊國樞、黃光國 (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 (95-133頁)。台北：桂冠圖書。
- 劉川鄂 (2000)。張愛玲傳。北京：十月文藝。
- 劉平等譯 (2000)。達文西對童年的回憶。台北：知書房。Freud, S. (1964). *Eine Kindheits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a Vinci*.
- 劉紹銘等譯 (2001)。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Hsia, C. T. (1979).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 潘柳黛 (1996)。記張愛玲。載於陳子善 (主編)，私語張愛玲 (26-31頁)。浙江：文藝。
- 蔡登山 (2003)。傳奇未完：張愛玲。台北：天下文化。
- 鄧明宇 (2005)。從沈淪走向能動：一個諮商實務工作者的自我敘說到社會實踐。應用心理研究，25，115-142。
- 鄭魯琳譯 (1994)。危急中的家庭：1920-1940中國知識份子論家庭。載於李小江等 (主編)，性別與中國 (38-62頁)。北京：三聯書店。
- 賴誠斌、丁興祥 (2005)。自我書寫與生命創化：以蘆荻社大學員蕃薯的故事為例。應用心理研究，25，73-114。
- 閻純德 (2000)。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 嚴志軍、張沫譯 (2003)。文明及其不滿。河北：教育出版社。Freud, S. (1927).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New York, NY: W.W. Norton & Co.

- Allport, G. W. (1937).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NY: Holt.
- Anderson, J. W. (1981). Psychobiographical methodology: The case of William James. In L. Wheeler (Ed.),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pp. 245-272).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nderson, J. W. (2005a). The psychobiographical study of psychologists. In W. T. Schultz (Ed.), *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 (pp. 203-209).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J. W. (2005b). Edith wharton and ethan frome: A psychobi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W. T. Schultz (Ed.), *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 (pp. 188-199).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enbaum, N. B. (2005). Four, two, or one? Gordon Allport and the unique personality. In W. T. Schultz (Ed.), *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 (pp. 223-239).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ms, A. C. (1994). *Uncovering lives: The uneasy alliance of biography and psycholog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ms, A. C. (2005). If the glove fits: The art of theoretical choice in psychobiography. In W. T. Schultz (Ed.), *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 (pp. 84-95).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 Horney K. (1937).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Horney K. (1939). *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Horney, K. (1945). *Our inner conflicts*.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Horney, K. (1950). *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The struggle toward self-realization*.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McAdams, D. P. (1988). Biography, narrative, and lives: An introduction. In D. P. McAdams & R. L. Ochberg (Eds.), *Psychobiography and life narratives* (pp. 1-18).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s, D. P. (2005). What psychobiographers might learn from personality psychology. In W. T. Schultz (Ed.), *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 (pp. 64-83).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rray, H. A. (1938). *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is, B. J. (1994). *Karen Horney: A psychoanalyst's search for self-understand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unyan, W. M. (1984). *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nyan, W. M. (1988). Progress in psychobiography. In D. P. McAdams & R. L. Ochberg (Eds.), *Psychobiography and life narratives* (pp. 295-326). Durham, NC: Duke Press.
- Runyan, W. M. (2005). Evolving conceptions of psychobi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lives: Encounters with psychoanalysis,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science. In W. T. Schultz (Ed.), *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 (pp. 19-41).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ltz, W. T. (2005a). How to strike psychological pay dirt. In W. T. Schultz (Ed.), *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 (pp. 42-63).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ltz, W. T. (2005b). Nothing alive can be calculated. In W. T. Schultz (Ed.), *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 (pp. 135-141).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收件日期：99年6月2日  
複審一日期：100年5月4日  
通過日期：100年9月2日

## "Alienation" as A Way Out of "Threat of Desolate" : A Psychobiography of Eileen Chang

Tsz-Yi Chang Shing-Shiang Ting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life of an important modern literature writer Eileen Chang using an psychobiography approach. The work of Eileen Chang is often shrouded in a desolate atmosphere. With very few exceptions, her characters are always struggling and fighting to earn a better life, but are encountered with futile results. Why are the characters of Eileen Chang devoting themselves to something that seems hopeless? The motifs of works do not appear out of thin air; instead, they are often highly related to the writer's own life course. This research provided answers to the mystery of creation, and revealed the life of Eileen Chang's early years with her parents (especially the mother) which were full of love-hate ambivalence. It also showed how the ambivalent feelings brought about disturbances and spiritual pain, and how Eileen Chang developed the detached personality described in Horney's psychoanalytic theory. Because psychobiography is a relatively new approach in Taiwan, this article bega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urposes and methods of psychobiography. Relevant personality and counseling theories, as well as recommendations for intervention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family, personality, psychobiography, treatment